

我的音乐人生

○严宝瑜（1948届外文）

晚年回顾一生，最令我欣慰的是我与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音乐浸润着我的心灵，给我的生命以及人生注入了力量的源泉。

走进音乐殿堂

我的家乡在江南水乡江阴县，我生在一个小康家庭，祖父在江阴开个油盐杂货铺，父亲也在店里干活。我从小就爱音乐，常常取下父亲挂在墙上的箫和笛子，学着吹奏《梅花三弄》《苏武牧羊》《旱天雷》等。如有民间的婚丧嫁娶，我便跟着乐队，聆听着吹打乐器传出的音乐，也喜欢和小伙伴钻到茶馆里听评弹。

1938年，我15岁。日本鬼子侵占了我的家乡，我亲眼目睹了鬼子对家乡进行的烧杀抢掠，对侵略者的仇恨的种子，深埋在我那幼小的心灵里。我不愿当亡国奴，就和几个同龄人结伴，绕道香港，经广东、广西、贵州到重庆。我的姑母在合川国立二中教书，我就在二中上了一年初中，三年高中。这时我一改过去顽皮不爱读书的习性，下决心读好书，将来造飞机打日本鬼子。我年年学习优秀，号称“分数大王”。

我最喜欢的仍然是音乐课。音乐课老师罗松柏教我们唱《嘉陵江上》《八百壮士》《旗正飘飘》，唱得我们热血沸腾。他用他私藏的各种口琴，还自制低音大口琴，组织我们成立了口琴队，演奏多声部的乐曲，我和一个同学还演出了贺绿汀的《牧童短笛》二重奏。他还约我们几个爱



严宝瑜学长

好音乐的同学到他家听留声机，放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贝多芬的作品，让我耳目一新，没想到天底下竟然有这么震撼人心灵的声音，这使我大开眼界，对音乐更加热爱了。

对音乐的着迷，致使我在临毕业前作了一个重大决定，我不考理工科大学了，我要去战时音乐教育的最高殿堂——国立音乐学院学习音乐。老师和同学们都不理解，认为我这个“高分生”不考名牌大学太可惜了，学音乐能有什么出路？我却认为音乐能把人类伟大、崇高的情感抒发出来，能用不可抗拒的力量使人善良、勇敢。我当时认为，一个作曲家创作出一个好的歌曲，比一个航空工程师设计一架飞机作用更大。在同学们日夜准备高考时，我却借住在青木关一位同学姨母家恶补理、弹琴，没有钢琴，就用风琴代替。发榜时我都不敢挤进人群去看榜，但终于发现榜上有名，我做梦似地跨进了全国最高音乐学府的大门。

音乐学院坐落在重庆郊区青木关的山坡上，练琴房在山坡上的茅草房里，房间里放的都是又破又旧的钢琴。山脚下一排茅草房是我们的宿舍，每间只有六张双人床，六个方凳。全校学生有一百二三十人。第一任院长杨仲子，是蔡元培的挚友，曾留学德国，他鼓励参加抗日救亡组织的学生，后被国民党撤换。后来的吴伯超院长，虽然也是音乐家，但他实行封建法西斯管治，由于嗓子沙哑，经常对学生大声训斥，被称为“豆沙”院长。当时学院里有进步组织，甚至还传抄、传看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但学校里也有三青团、中统军统特务监视着进步同学。

我当时虽然不满国民党，不满学校的管制，但还没有参加组织，比较任性。由于下大雨宿舍房顶漏了，我便带头搬到新建瓦房自修室去住，被记大过一次；又由于深夜偷弹香港买来的新钢琴，记大过一次；再由于清晨偷弹钢琴记两小过，差点被开除。最不能容忍的是因此取消了我的练钢琴权。学校让我去跟章彦先生学小提琴，但我没有小提琴，幸好女同学黄佩贞把她珍贵的小提琴借给我用。祸不单行，在调琴弦时我用力过度，把一根弦弄断了。当时在烽火连绵的中国，根本买不到提琴弦。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恰好学校贴出布告，昆明美军战地服务团译员训练班招生，我和同学好友商量，先去当一段译员再回校复学，是摆脱当前困境的好办法。

1943年11月，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青木关。经过一个多月培训，我被分到云南祥云国民党52军14师当美军翻译，干了大半年。二战时期，虽然美国军队是中国的

盟军，但是美军官兵歧视中国人的事情比比皆是。我亲眼所见美军士兵傲慢无理，开着吉普车横行霸道，欺辱中国人。特别不能容忍的是他们用下流语言污辱《义勇军进行曲》。我一气之下，在一位译训班同学的帮助下，偷乘小飞机离开了军营，回昆明到西南联大找同学去了。

响亮学运歌声

1944年夏天，西南联大招生，我考进了外国文学系。当时外国文学系除英文为主科外，还要求每个同学再选一门第二外语课程，我选了杨业治先生的德语，因为德国是贝多芬等知名音乐家们的故乡，是古典音乐的发祥地。

当时联大民主气氛很浓，各种社团很活跃。黎章民和周锦荪同志创建了“高声唱歌咏队”，他们听说我是国立音乐学院来的就找我参加，我当然很高兴。那时唱的大多是抗战歌曲：《光明赞》《喀秋莎》《我所爱的大中华》等，也唱云南民歌和讥讽国民党黑暗统治的《茶馆小调》《古怪歌》《五块钱》《插秧谣》等。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面目日益暴露。11月25日晚，在联大广场上召开反内战时事报告会，约有五六千人参加。钱端升先生刚一发言，校外就响起了枪声，电灯也熄灭了。在这危急关头，我们“高声唱歌咏队”在黎章民总干事领导下，全体齐声高唱孙慎同志作的《我们反对这个》（内战），歌声压倒了枪声，会场立即安静下来，主持人叫点上汽灯，会议照常进行。大家声讨反动派、反对内战的声势更大了。

第二天，全校罢课。“高声唱歌咏队”和其他进步社团组织了多支宣传队上

□ 回忆录

街宣传反内战。黎章民同志还写了《告同胞》新歌，外文系林方其同学写了《告士兵》，歌词是：

兵士们，兵士们！八年抗战的兵士们呀！人民的血汗快流干哪！人民在希望，人民在呼号，您的枪口不能再对内哪，屠杀你的父老兄弟和姐妹啊！人民在希望，人民在呼号，放下你进行内战的冲锋枪呀！英勇地站过来啊！让我们高声喊哪，反对内战！反对内战！

我马上把它谱成歌，《新华日报》全文刊载。我和黎章民在一个教室里反复教上街的宣传队唱这两支歌。

11月18日以后，特务们开始在街上殴打宣传队员，市民们纷纷出来保护。12月1日中午，国民党军警包围了西南联大，并冲进校园大打出手，还扔了手榴弹，炸死了潘琰、李鲁连、于再和张华昌，四位烈士的遗体就停放在图书馆阅览室，我参加了有二三十人组成的护卫队守在他们身边，防止反动派劫尸灭迹。这个事件引起了全市人民的公愤，罢课、罢工、罢市，抗议反动派。这件事还震动了全国，史称“一二·一”运动。

经过和反动派反复谈判、斗争，决定



“高声唱歌咏队”部分队员合影

于1946年3月17日为四烈士送葬。反动派百般阻挠，虽然不得不答应送葬可以抬棺游行，但不许贴标语、喊口号。我们有理有节，同意了这条件，因为可以用唱歌替代喊口号，可以沿途设灵堂挂挽联、读祭文代替贴标语、喊口号。

黎章民找我，当时虽然已有一首《一二·一烈士挽歌》，但不适合走着唱，他要我作一首可以由游行队伍边走边唱的《送葬进行曲》。那是一个初春上午，我和好友陈庆华在文林街茶馆看书。我脑海中响着我知道的中外葬礼进行曲，突然脑中出现了贝多芬第七交响曲第二乐章起始的庄严沉重的节奏，又想到四烈士血迹斑斑的形象。我一气呵成写了出来：

天在哭、地在号，风唱着摧心的悲歌。

英勇的烈士啊！你们被谁陷害了？你们被谁杀害了？

那是中国的法西斯、那是中国的反动者，是中国人民的仇敌。

今天，送你们到那永久的安息地；明天，让我们踏着你们的血迹，誓把那反动势力消灭。

我唱了一遍给陈庆华听，又走着唱了一遍。当时，一时兴起又作了一首，但不能走着唱。我立刻把两首都送给著名的音乐人赵沅同志（解放后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他没作任何修改，说“就它吧！”于是第一首《送葬歌》成了3月17日三万送葬队伍的主歌。第二首歌没传开，但赵沅同志在群众场合独唱过。解放前后，《送葬歌》一直在传唱，并被刊入各种歌集，署名一直是“高声唱词曲”。解放前是为了保护作者，解放后我也没有要求改署我的

□ 回忆录

外围组织“民青”，1948年在清华参加了地下党，当年毕业后都留校做助教。1949年8月27日，组织上批准我们结婚，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婚礼。

那天在清华工字厅挤满了人。李广田、杨业治、李赋宁等老教授来了，总支书记何东昌来了。我在重庆音院的好同学、我终身的挚友严良堃夫妇来了。大家唱歌咏队、新生歌咏队、教工合唱团的好友们都来了，有些人还是刚从老解放区回来的。婚礼很简单，只有些花生、糖果。大家要我报告恋爱经过，何东昌帮我解了围，说：“这是结婚，不是开生活检讨会。”一句话引得哄堂大笑，于是歌声成了主题。新房是借一位出差老师的，没有什么新婚装饰。但大家还是要闹洞房，用唱歌大闹洞房，一直唱到凌晨两三点钟。

我和琼瑁先在清华教书，1952年院系调整同时调到北大。无论顺境逆境，两人互相关爱，辛勤培育下一代。不幸在2006年，她81岁时因不治之症先我走了，我常常怀念与她相伴一生的情景。

在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简称西语系，系主任是冯至同志。德语成立专业，我是唯一的助教。冯至同志是我国德语界泰斗，他在北大任教期间，我一直兼任他的秘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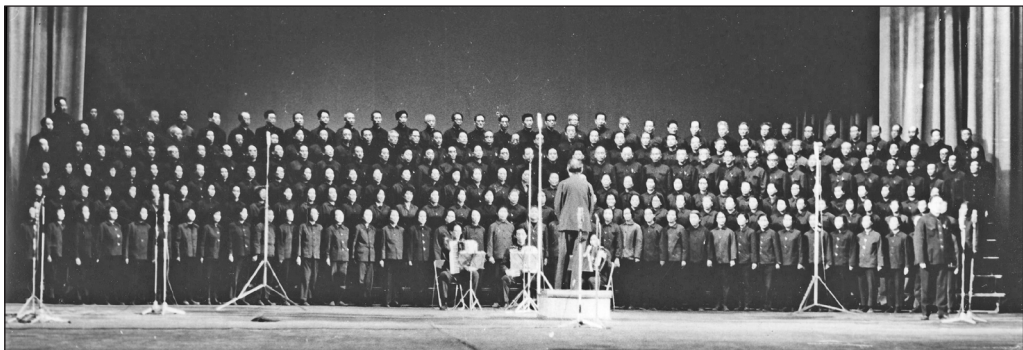
1954年秋的一天，马寅初校长找冯至主任，说胡乔木要北大出一个德语教师替出版总署作为编辑到德国出版社实习一年，是中德文化协定的一项内容。冯至主任

认为学编辑，不想让我去，但马校长坚持，他只好同意。

1954年11月23日，我乘国际列车经莫斯科到了柏林。没想到刚下车，使馆人员就把我交给了德方人员，让我马上去莱比锡参加全德出版大会，我说我讲不了德语，但德方人员说，你会英语，给你派了位英文译员陪你。到了莱比锡我才知道这是一个有苏联和捷克、波兰等东欧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会上还要我代表中国出版界发言。我马上打电话向使馆求援，使馆宋钟璜同志说，你不讲话可不行。我说我不是出版界的，他说你可以讲德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出版情况。这可是个好主意，我很熟悉这方面的情况。我使用英文写了稿，德国翻译译成德文。本想用中文发言，后来想我读德文还是没问题的，就在会上直接念德文稿子。没想到我的讲话得到热烈反响，当我提到安娜·西格斯的《第七个十字架》已在中国翻译出版，全



闹洞房的歌咏队部分同学合影。前排：右3 严宝瑜、右4 吴琼瑁、左1 严良堃，后排：右3 严良堃爱人张世敏。其他凭记忆：前排：右1 李振华、右2 周全（原名周汝汉）、右5 严若昭、右6 刘晶雯，后排：左1至左6：李建武、郭其隄、方堃、梅克、杨荣、商令杰，右1 陈水莲、右4 冯碧蕻



1980年在人民大会堂的专场演出

场掌声雷动。我讲完后获得的掌声超过了苏联文化部长。没想到热爱音乐的德国人竟然是用演奏名曲来做闭幕式，演奏乐队是从大音乐家亨德尔家乡请来的“哈勒交响乐团”。从此我就在这乐圣之乡度过了四年。

民主德国出版局改变了让我实习的计划，同意我补习德语，治疗“德语聋哑病”。我先到莱比锡大学附设的赫尔德学院学了两周，他们说我这水平应直接进入大学，让我找副校长办公室，办公室看了我的学历，说我应直接读研究生。主管副校长还接见了。最后让我搬进一个小楼里，里面住着5位中国留学生，其中安书祉就是我选派的北大德语专业一年级生。

莱比锡大学（1409年建校）是和海德堡大学（1386年建校）齐名的德国最古老的大学，它在十七、十八世纪是德国启蒙运动的中心。民主德国建立后，曾把它改名为“卡尔·马克思大学”。我在这里师从汉斯·迈耶教授读了四年研究生。我改变了初期闭门死读书的办法，利用我已有的文学基础，打破德语不流利的顾虑，尽量接触德国民间，广交朋友，熟悉德国文化。更利用各种机会接触德国闻名世界的

音乐圣堂，收益甚大。

1959年秋，接到冯至系主任的信催我回国，当时我已定好博士论文题《中国革命在二三十年代德国文学中的反映》，再有几个个月就可完成，虽然导师也很难理解，我还是服从组织命令，立即回到北大。冯至主任要我担任西语系副主任，主管教学、科研。“文革”后，教育部成立了外语教材委员会，冯至任主任，我是副主任之一，主管德语组。奋斗十年，我们把四个年级的德语教材、选读教材、德国文学史、德国国情课等教材全部编好出版。教育部开大会表扬了德语组，并给我和副组长祝彦发了荣誉证书。《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主编是冯至，他让我参加了德国文学卷的部分工作。

1983—1984年，我获歌德奖学金，赴民主德国魏玛参加德国古典文学研究所科研项目研究工作8个月。1988年，我受联邦德国拜罗伊特大学之聘，任该校客座教授讲比较文学。1988年，我获得了民主德国的“格林兄弟奖”，奖励我在德国文学研究和两国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我把奖金5000马克都捐给学校以推动美育教育。

用高雅音乐陶冶年轻人的心灵

1983年我60岁，不再担任行政工作，但我还教研究生，还为外事部门办翻译班，培养高级翻译。

1986年，北大开党代会，我在发言中提出应该恢复蔡元培校长重视美育的传统，开设美育方面的课程，受到代表们和校领导的重视。丁石孙校长让我和团委副书记范强筹划创办艺术教研室。一开设音乐课，就有600人报名，不得不分两个班。找不到音乐教师，我只好赶鸭子上架担任一个班的音乐课。我开设过的课依次有“音乐简史及中外名曲赏析”“维也纳古典乐派”“莫扎特”“贝多芬”和“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音乐”5门，其中最后两门开设的次数最多，都是学期课，周学时为3小时，后成为学校的通选课。它们是带有一点音乐史性质的欣赏课。从1986—2004年18年间，除去我在德国讲学两年，共教了16年音乐课，直到81岁。

除了上音乐课，我还在校领导支持下办了三次大活动。1991年为纪念莫扎特逝世200周年举行了“莫扎特月”纪念活动；1992年为纪念刘天华逝世60周年，组织了“刘氏三兄弟（刘天华、刘半农、刘北茂）纪念活动”；1993年举行纪念柴可夫斯基逝世100周年活动。这些活动都请了校外知名音乐团体、音乐家来校演出。艺术教研室组织了有关专题唱片欣赏会，请知名音乐专家举行讲座。校广播台不断广播有关乐曲，北大校刊为活动出了专刊。全校师生浸润在浓厚的高雅音乐气氛中。

1997年秋，我有幸参加了李岚清副总

理召开的关于如何在全国500万大学生中普及交响乐的座谈会，他听了我的发言，要我提供教学情况的材料。他在看了这些材料后给我写了一封信，对我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和鼓励。

为了实现在全国500万大学生中普及交响乐的目标，2000年1月，在全国高校音乐教育学会的倡导下，我在北大主持了全国高校交响音乐课教师培训班。组织了各校优秀音乐老师、美育老师、历史老师、美术老师、中国文学教师，前来参加培训。这次培训使学员们受益匪浅。培训结束后，还为学员们颁发了结业证书。从此，“全国高校交响音乐课教师培训班”成为制度，在上海、广州陆续举办了课程培训。

音符化作音乐的内在的精神力量，支撑着我度过人生道路上的困难和挫折。我对音乐欣赏的体验，使我深知好的音乐能以其巨大的正能量，通过人的听觉器官，对人起着潜移默化的感染力，直指人的内心世界。

回顾我的一生，我生来喜好音乐，已经走进音乐殿堂，却阴差阳错地又走进德国文学的殿堂，似乎走错了门。解放初，我在重庆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和伙伴们许多都来到北京，从事新中国的音乐事业，他们也召唤过我归队。但那时我已是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安排。现在回想文学和音乐也是不可分的，尤其我从事的德国文学，更是紧紧地和音乐融和在一起。说“我的音乐人生”绝不不过。

写于2019年

2020年7月1日，严宝瑜学长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